

# 文化心理与戏曲美学

周 明 / 著

A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performer, likely a female soldier or general, is depicted in a dynamic pose. She wears a white face paint with red and black markings, a blue and gold patterned robe, and a large, ornate headdress with flowers. Her right arm is raised, holding a long, thin spear or staff.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orange color.



上的人，整天  
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艳华

封面设计 刘画生



## 文化心理与戏曲美学

ISBN 7-104-01934-0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7-104-01934-0.

9 787104 019343 >

ISBN7-104-01934-0/J·832  
全四册定价：120.00元



# 文化心理与戏曲美学

周 明 /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心理与戏曲美学 / 周明著.—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12

(福建艺术丛书)

ISBN 7-104-01934-0

I . 文... II . 周... III . 戏曲—艺术美学—研究

IV . J80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4987 号

福建艺术丛书·文化心理与戏曲美学

周 明 著

---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130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50 印张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104-01934-0/J·832 全四册定价: 120.00 元

# 目 录

绪论 .....	1
<b>第一章 哲学精神 .....</b>	<b>7</b>
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本质内核在艺术上的呈现 .....	7
第二节 渗入骨髓中的“忧患意识” .....	20
第三节 古典戏曲对哲学的呼应 .....	28
<b>第二章 宗教精神 .....</b>	<b>37</b>
第一节 中国人宗教观念的淡薄 .....	37
第二节 古典戏曲中宗教的渗透 .....	43
第三节 实用宗教在戏曲中的观念表现 .....	49
<b>第三章 悲剧精神 .....</b>	<b>56</b>
第一节 无奈与悲怆 .....	56
第二节 死亡的沉思 .....	62
第三节 回避悲剧的背后 .....	73
第四节 团圆的审美意义 .....	81

<b>第四章 生存况味 .....</b>	<b>85</b>
第一节 多重心态与立体人生 .....	85
第二节 情感的演绎与解读 .....	96
第三节 潜意识的内涵 .....	105
<b>第五章 诗情画意 .....</b>	<b>120</b>
第一节 诗的意境 .....	120
第二节 写意原则与程式化原则 .....	128
第三节 时空观念 .....	146
<b>附录 .....</b>	<b>159</b>
<b>主要参考书目 .....</b>	<b>186</b>
<b>后记 .....</b>	<b>189</b>

## 绪 论

“美学”(Aesthetica)一词最早是由德国人鲍姆嘉通(1714—1762)首先使用的,他认为,逻辑学研究理性认识,伦理学研究意志,这是早已确定了的,应该还有一门学问研究感性认识领域,于是他倡议并建立了这门科学。1750年鲍姆嘉通的专著《美学》发表,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正式成立。

自鲍姆嘉通始,美学走过了二百五十余年的历程,各种美学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美学的许多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在诸如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等方面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这种现象本身说明,感性认知的世界是极其复杂而难以把握的,要想在美学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有待于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研究的突破。所以现代的美学家大多转而从艺术现象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史等角度进行具象的研究,以期不断地积累实证与微观分析的经验,从而推动长期停滞不前的美学向纵深发展,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研究的新成果。戏曲美学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是一门年轻而处于初始研究状态的学科,在戏曲美学的领域中有许多的处女地等待着人们去开垦。

戏曲是中国特有的演剧样式,其中包含着中国人对以人的肢体语汇、对白、音乐等为媒介的艺术表达的独特理解,它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演剧体系,它是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哲学观念、文化心理结构在艺术演绎人生

上的反映，是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对应物，凝聚、积淀了中国人的艺术价值观。在戏曲美学的研究上许多人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或从戏曲演变史和古今戏曲作品的实际出发，对戏曲的艺术规律和特征进行总结（如张庚、郭汉城等）；或从戏曲欣赏的角度力图揭示戏曲的审美心理奥秘（如余秋雨等）；或从戏曲表演的独特性入手，探索戏曲表演的美学意义（如陈幼韩等）；或从三大演剧体系的不同特质的比较研究中阐释戏曲艺术的表述风格（如康洪兴等）。但是，所有这些研究似乎都存在着重视戏曲艺术现象，忽视戏曲艺术本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潜藏在戏曲艺术背后而对戏曲艺术影响最为深刻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研究不足。由于这个缺憾的存在，使得对戏曲发生学和戏曲艺术形态本源的追溯显得苍白无力。而在戏曲艺术与其它学科的横向比较研究中，大多只注意到了戏曲艺术与相关艺术门类（如绘画、舞蹈、音乐、文学等）的共性研究，而很少从哲学、伦理、宗教等组成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最主要因素上进行深入的探索。有的论述则将现代某一美学流派的基本观点和框架生搬硬套到戏曲美学的研究上来，不仅显得艰涩、浮浅，而且游离了戏曲艺术的内在规律。

关于戏曲艺术的特征，人们经过细心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概括和总结，诸如戏曲是诗剧，戏曲是着重写意、虚拟、程式化的艺术等等，这些概括和总结符合戏曲历史与现状的实际。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支撑了这些特性的存在，哲学、宗教、文化诸心理意识在哪些方面怎样作用与影响着这些特性的形成，却研究得甚少。也就是说我们对戏曲美学特征的必然性和可然性尚研究不足。我们不能只是从现象到现象，而应当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鉴于此，有必要从本质的问题上，也就是从中国文化心理

结构的角度上对戏曲艺术进行一番审视，进而对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的形成进行追寻探讨。这是本书的立足点也是它所要达到的目的。

所谓“文化心理结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是人的各种理性智慧（如科学、哲学等逻辑推理思维）与感性认知（如艺术的形象思维、宗教的潜意识等）在心理层次上以某种自为的秩序所组成的能动状态；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是人对自然、社会的实践认识反映在心理上的感知总和；从历史学的角度上讲，是人类的文明历史进程的轨迹积存在心理上的集体意识形态。审美心理结构是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个子结构，它对应于人对美（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的审视把握。文化心理结构与审美心理结构之间没有必然的分野，相反，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显然，研究戏曲美学离不开对中国人文心理结构的研究，更离不开对中国审美心理结构的研究。不管是从艺术作品的现实出发，总结戏曲的审美特性和文化内核，即自下而上的研究；还是从文化背景入手，分析、体验戏曲的美学意义，即自上而下的研究，我们都应该忽略文化心理结构这个重要的领域。

哲学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人类理性地思索自然与社会一切问题的总纲，也是人类感性地体认世界的潜意识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不是或不只是科学方法论，不管这种方法论的范围如何扩大。哲学始终是科学加诗。它有科学的方面和内容，即有对客观现实（自然、社会）的根本规律作科学反映的方面；同时又有特定时代、社会的人们主观意向、欲求、情致表现的方面。它总包含有某种朦胧的、暂时还不能为科学所把握所规定的东西，而这又总是与人的存在和本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纠缠在一起。每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

赋予这些永恒课题以具体的新内容。”<sup>①</sup>在这个意义上，宗教非理性地体认人生与宇宙的奥秘，美学写意地把握艺术的真谛都可归入哲学的思维。并不是只有逻辑严密、经过科学论证最终导向结论的东西才称为哲学，人类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支持这样的说法。李泽厚所说的这些朦胧的东西正是与艺术息息相通的东西，这在偏重于实践理性的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的哲学思想，不仅探讨人生的价值，厘订道德伦理规范，建立社会人际关系，而且总是将礼仪(秩序)与祭祀(宗教)相连，教化(道德)与诗乐(艺术)相溶，常常以一种体悟式的思维方式感知事物，得出富有诗意的哲理结论。我们有时甚至分不清它是哲学论述还是美学论断。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更接近于一种审美思维，他们的论述也更易于探近艺术的本质。以儒道为主流的先秦理性精神千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渗透于包括艺术在内的各个方面，是构成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一时的感悟和片断的闪光上，我们应当运用这种特殊的也是最艺术化的思维方式，更全面地考察中国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以使我们对戏曲艺术在审美的把握上更接近于内核，更能阐释和破译戏曲艺术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的研究方式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去建立什么体系，我们只是力求拓展自己的视野，尽力全面地考虑戏曲艺术内质上的方方面面的勾连及其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影响。

宗教是人类对超自然的神灵的非理性信仰，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的意识中虚幻、变形的反映。宗教意识的产生较之

---

<sup>①</sup>李泽厚《美学的对象与范围》载《美学》1981年第3期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绪 论

---

哲学思想的产生更早得多，从原始的、以图腾崇拜为特征的早期宗教意识的萌芽到后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庞大的宗教体系，宗教意识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并且对人类文化心理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者们常说“中国人宗教观念淡薄”这一话题，其实，中国人内在的宗教冲动和宗教热情一点也不比西方人差，只是我们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一切自觉与非自觉的信仰，一切寻求救世主的冲动，一切通过仪式净化心灵的渴望，一切因为灵魂有了归宿的狂热，一切殉道式的牺牲，都属于宗教意识的范畴。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产生得较晚，也不如西方发达，这是中国人从原始思维向文明思维转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条与西方人不同道路的缘故，其间还受了诸如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制约。然而，深藏于中国人心中的宗教意识丝毫不曾减弱，总是以各种形态顽强不屈地表现出来，时常左右着人们对人生价值观的判断，更是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艺术的理念和欣赏的原则的确立。

悲剧精神与哲学精神、宗教精神密切相关，它是人们以哲学、宗教为基点的对人生遭遇的审美体验。“忧患意识”是这种体验积累于中国人心中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思想状态，也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悲剧精神（美学意义上的）是哲学精神和宗教精神的契合点，是两者之间相溶相通的心灵桥梁，对悲剧精神的研讨直接诉诸艺术的内质，诉诸审美心理，特别对于戏曲美学的阐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悲剧精神既是人生价值判断，更是人的审美心理的描述，在文化心理结构中它具有可感性、可体验性的特征，不仅表现出时代的精神，而且总是传达出整个历史文化进程在人的心灵中的积淀。它是人类长期在对自然的斗争中和人类社会自身完善的过程中积聚在心理上的深

刻的教训与反思，但却是一种朦胧的、感性的、写意式把握的心理意识。它不同于哲学精神理性思维，也不同于宗教精神的幻像心理，但是哲学精神和宗教精神又都以各种组合方式渗透于悲剧精神中，不能也无必要将它们剥离析分，它的内核要旨只有在哲学与美学层面上才能得到有价值的论述。

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入手，以哲学精神、宗教精神、悲剧精神为视角，对戏曲艺术的审美特性进行界定、分割、体验、总结，或许我们会有意外的收获。这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途径。

# 第一章 哲学精神

## 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本质内核在艺术上的呈现

哲学意识的产生，首先是人类在对自然的抗争、改造、利用的过程中自我反省的结果，其次才是对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体察、领悟、总结的产物。它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处于初级阶段时主要是人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各种灾难所进行的感性化的推测；进入文明社会后，则表现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领域中有意识的逻辑思索。哲学是人类理性精神的直接表述，是人的宇宙观、科学方法论、人生价值、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的总则。康德将注重研究人与外在世界（自然的、物质的）关系的哲学称之为“纯粹理性”，将注重研究人与社会（伦理的、人际的）关系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理性”。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与西方哲学不同的道路。西方哲学尤其是以古希腊为源头的欧洲哲学，偏重于追求知识，偏重于探讨自然界的必然性，对客观对象多采用分析、推理、区分、归类、总结的逻辑思维手段，对数的秩序与结构、对物表象与本质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以期揭示物质内部及人与外间世界的规律。西方古典哲学家几乎都是了不起的自然科学家。中国的哲学则不然，它注重研究人自身的行为和思想，不重视客观对象实体及其内在联系的精确描述，注重建立道德和社会

意义上的秩序，致力于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追求道德的平衡，追求精神领域的自由。套用康德的术语，可以说西方哲学更多地是属于“纯粹理性”的范畴，中国哲学则更多地是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

偏重于“实践理性”，必然离不开对人自身价值的探索，离不开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认识，离不开对伦常情感的实践总结和具体感受。中国哲学的第一个辉煌成就是以儒家和道家为主流的“先秦理性精神”。儒家讲的是以“仁义”为中心的个人道德修养和人际伦常的界定，它导向人与社会的统一；道家讲的是“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的人格理想，强调的是以本体为中心的宇宙意识，它导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道德修养和人格成就上两家有着共同的地方，达到了某种内在的一致。儒家思想对后人在社会关系和人伦纲常等方面产生了持续的影响，道家思想则在心理意识和思维方式上影响着千百代人的艺术理想，这便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它们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它们的矛盾往往表现为历史与人、政治与艺术、社会与自然的矛盾。

“纯粹理性”的哲学意识表现在艺术观上就是再现论。亚理斯多德在戏剧理论上的模仿说就是再现论的具体阐述，他说：“喜剧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sup>①</sup>到了古典主义戏剧那里，再现论被表述为严格地遵循“三一律”，到了自然主义那里，则建立起了著名的“第四堵墙”：“观众必须暂时忘记自己是在剧院里，为此我们相信有必要在大幕打开时立即关熄场灯，这样舞台画面就突出了，观众也

① 亚理斯多德《诗学》

更集中注意力于舞台。……演员要表演得像在自己家里那样，不去理会观众的反应，任他们鼓掌也好，反感也好。舞台前沿应是一堵第四面墙，它对观众是透明的，对演员是不透明的。”<sup>①</sup>再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再现论的戏剧观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被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这样的戏剧艺术多追求美与真的统一，追求与生活真实的一致性。在古希腊哲学氛围的笼罩下，表现在艺术上便有了气势磅礴的“荷马史诗”和悲天悯人的古希腊悲剧，这种叙事体的文学在西方很早就形成了高峰。中国则不然，因为偏重于“实践理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在艺术上就体现为表现论的艺术观。所谓“文以载道”，所谓“诗言志”，就是要“以意为主”，“取会风骚之意”，而后以“以辞达意”，“以形写神”。王元化先生说：

中国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把一切都同道德伦理挂钩。孔子的哲学主要是道德箴言，思辨色彩不浓。在自然观上，中西有着不同的形态，倘把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对照来看，希腊是朴素的直观，中国是天人合一。古代文论的“天地人”三才说也是把自然纳入人的道德规范之中。从亚里斯多德《诗学》开始，西方人提出自然的模仿说，中国没有自然的模仿说，因而很少有史诗、长篇叙事诗，这跟思维方式相关。中国重政教伦理，反映到文学观上就是原道、明道、载道。至于言志说，也和希腊的模仿说

<sup>①</sup> 莫迪凯·戈尔里克《推陈出新的戏剧》转引自吴光耀《西方演剧史论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

异趣。自然模仿说自然不好，但比道德教诲说要好一些。中国的文学观离不开政教伦常。

——《思辨随笔》

模仿说推到极致就是自然主义，如左拉的小说和戏剧；表现说推到极致就是实用主义，如明代的道德说教剧。模仿说与表现说并无高下之分，只是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

与“荷马史诗”相对应，以《诗经》为滥觞的中国古典文学是以抒情体的诗歌为主体的，小说戏曲的繁荣是唐宋以后的事情。诗历来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词则被认为是“诗余”，曲又是在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古人的意识中，曲只是“诗余”的“诗余”。这种诗、词、曲的排列顺序，不是简单的时间性的因承关系，也不完全是艺术内在发展规律的描述，而是中国人艺术价值观的自然表露，是中国人哲学意识在艺术上的必然反映。纵观中国的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雕塑、舞蹈和中国特有的书法在内，可以说都是诗的艺术。这是因为抒情性的诗歌最符合中国人的哲学意识与思维方式。即使是小说戏曲这样叙事体的艺术也处处洋溢着诗的韵律，以诗的手法写人写事写景，它遵循的不是叙事的原则，而是思想感情的内在规律。

《牡丹亭》情节跌宕起伏，离奇之至，但这情节，叙述这情节的手法和文辞却是按照情感的逻辑来安排、处理的。汤显祖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

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sup>①</sup>因此，不管戏曲是不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也不管诗与词在戏曲的形成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戏曲是用诗的方法来抒情、达意的，这一点没有疑义。戏曲是组成中国诗的艺术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部分。一切适用于诗的内涵的定义几乎同样地适用于戏曲。

如果我们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那么哲学就是艺术，艺术也就是哲学。深刻的哲学思想必然凝聚着文化艺术的心理意识，而任何没有深刻哲学思想的艺术也就不是好的艺术。哲学是人对自己实践道路的自我反思，它不仅包括分析、推理、解释等逻辑思辨，也包括着对人自身的直觉认识和对那些暂时无法被精确阐述的与人自身相关连的事物的感性体验。人的存在的永恒性也将使哲学和艺术获得永恒的意义。

从现实生活中将概念、感受上升为哲学意义的理性思考，然后又化入艺术创作的无意识之中，这是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的戏曲作家们时常将自己的创作与中国古典哲学自觉地联系起来，他们各自根据自己所崇拜的哲学思想（作家根据什么思想来写作这是个很复杂的现象），力图在作品中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这种人格决非人物性格，它不是作家艺术上追求的目标，而是作家哲学思想上追求的境界。《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一部极难得的现实主义作品。虽然它的每个细节几乎都经得起推敲与考证，但作者自己讲得明白，他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可见历史的事件只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媒介而已。“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桃花扇》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且富有浪漫主义的气息：侯方域和李香君各自历尽艰难

①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